

二十卷本《搜神记》考

李剑国

从明代万历间开始流行于世的二十卷本《搜神记》，是明人胡应麟辑录，可能又经他人增补修订的一个辑本，质量很差，不是一个可靠的本子。有鉴于此，笔者发愿重新辑校《搜神记》（包括《搜神后记》）。在工作过程中，对二十卷本作了许多研究，比笔者十多年前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对二十卷本《搜神记》的讨论^①，自觉有很大进步。今撰作此文，围绕二十卷本《搜神记》的若干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重新作一检讨和考证。

一、《搜神记》著录流传考

《晋书》卷八二《干宝传》、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七、《册府元龟》卷五五五《国史部·采撰一》均载干宝撰《搜神记》三十卷。《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见著录，又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鬼神家、《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均作《搜神记》三十卷。此后，宋人公私书目明确著录《搜神记》三十卷的惟有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传记类冥异属），但郑氏《艺文略》乃综合前代书目史志而成，并非其藏书目录，所著干宝撰《搜神记》三十卷必是据隋唐史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小说类亦有《搜神记》，则系尤氏藏书。今本《遂初堂书目》出自陶宗仪《说郛》（卷二八），撰人卷数皆为陶氏削

去，无法知道这本《搜神记》究竟是不是干宝所撰三十卷本。《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有《搜神总记》十卷，释云：“不著撰人名氏，或题干宝撰，非也。”《中兴馆阁书目》小说家类著录此本，全引《崇文目》之说。而《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作干宝《搜神总记》十卷，注“不知作者”。盖据《崇文目》之“或题干宝”妄加撰名，又据“不著撰人名氏”注曰“不知作者”，以致于自相抵牾。《遂初堂书目》小说类又有《搜神摭记》，疑即《搜神总记》^②。《搜神总记》书名卷数均与《搜神记》不合，肯定不是干宝书，《崇文总目》的释文是崇文院馆臣寓目原书所作，自然可信。有的学者认为《搜神总记》十卷本就是干宝《搜神记》^③，说非。

南宋著录极富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均无《搜神记》，说明《搜神记》在南宋罕见流传。南宋初朱胜非所编《绀珠集》卷七摘录干宝《搜神记》十一条，曾慥《类说》卷七摘录《搜神记》十二条，其中“阿香推车”实出《续搜神记》^④，“审雨堂”实出《妖异记》^⑤，可见《绀珠集》、《类说》即便非转引他书，其所据《搜神记》也已不是原书，与《续记》相混，并孱入他书内容。元末陶宗仪编《说郛》，收书极多，但他没看到《搜神记》，只是在书中卷四从《类说》转录了三条。这些情况表明《搜神记》在宋元间已经散佚，前人疑其南宋已佚^⑥，是大体可以成立的。

明人书目，或亦可见关于《搜神记》的著录。明英宗正统六年（1436）杨士奇登记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从南京移贮北京文渊阁的国家藏书为《文渊阁书目》，卷一六道书类有《搜神记》一部一册，叶盛《菴竹堂书目》卷六道书类也曾著录《搜神记》一册。嘉靖中高儒《百川书志》卷一一子部神仙类著录《搜神记》二卷，干宝编。嘉靖中周弘祖《古今书刻·书坊》杂书类著录《搜神记》，表明嘉靖前坊间曾刊行《搜神记》。隆庆万历中《赵定宇书目》著录《稗统续编》，中有《搜神记》一本。这几

本《搜神记》，作者、卷数大都未加说明，惟有《百川书志》著录为二卷，并称干宝编。但须注意的是《百川书志》与《文渊阁书目》、《蓁竹堂书目》都隶于道书类或神仙类，而干宝《搜神记》并非神仙道书，可以推断所著录的不是干宝书而是同名的其他书，而在元明时期确有道书类的《搜神记》。《古今书刻》著录书坊所刻者和《稗统续编》所收者大约也都是这类书，要不便是干宝书的辑本，或者即八卷本《搜神记》亦未可知^⑦。

从《搜神记》问世后袭用于宝书名的很多，北魏昙永《搜神论》、唐代句道兴《搜神记》、宋代流传的《搜神总记》都是这样的书，宋明间冒名《搜神记》的道书也有几种，而明代还出现了一本八卷《搜神记》，凡此都不是干宝《搜神记》，大都是有意托名《搜神记》，下边讨论这一问题。

二、《搜神记》异本考

《续道藏》有《搜神记》一本，六卷。前有《引搜神记首》，未署名，但文中作引者自称“登”，即明人罗懋登^⑧。引云：

昔新蔡于（干）常侍著《搜神记》三十卷，刘惔见，谓曰“鬼之董狐”。夫于（干）晋人也，迄今日千百年，于斯善本已就圯，虽间刻间有之，而存什一于千伯，不免贻漏万之讥。登不肖走衣食，尝遡燕关，探邹鲁，游齐梁，下吴楚欧越之区。……万历纪元之癸巳，来止陪京。为批阅书记，得《搜神记》于三山富春堂。读之，见其列以卷，别以类，且绘以像，质之不肖前日所周览者而一墨。盖不袭于（干）旧，能得于（干）意，发于（干）未明，增于（干）所未备。

罗引说干宝书“于斯善本已就圯，虽间刻间有之，而存什一于千伯”，证之以《古今书刻》，万历前确有刻本。如果坊间所刻确是干宝书的话，大约很可能是后人的辑本，而且很不完备；不过罗懋登所说坊间所刻也未必定是干宝书，恐怕是有其名而无其

实的别路货色。六卷本《搜神记》乃罗懋登万历癸巳（二十一年，1593）得于南京，与干宝书了不相干，罗懋登自己已说得很清楚^⑨。它实是在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基础上增补而成。考书中有云“本朝洪武初”，“本朝洪武永乐中”，则系明永乐后人所编，而在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岁之前久已刊行流传于世，罗懋登得其本，复又刊之^⑩。

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分前后集，有插图。题淮海秦晋^⑪，中称元为“圣朝”，出于元人无疑。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子部著录有此书，著录作《元板画相搜神广记》前后二集二本，注：“凡三教圣贤及世奉众神皆有画像，各考其姓名字号爵里及封赠谥号甚详，亦奇书也。”

明世又有一本《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叶德辉得明刻本，于宣统元年（1909）影写重刊。叶氏谓“此书明人以元板《画像搜神广记》增益繙刻”^⑫，少许内容取自明刊《搜神记》六卷本，但大部分系自增。

元代尚流传有另一种《搜神记》。明刊《国色天香》卷一《龙会兰池录》^⑬中蒋世隆云：

予尝稽董狐《搜神记》，释迦乃维摩王子。观音，妙庄王女。达摩至卢能，托芦传钵六叶，卒于汉溪。佛祖则宜春县人，曰印肃。老君则楚县人，曰李耳。张真人道陵，乃汉张良后。许真人逊，晋零陵令。吴真人猛，时真人奇，皆晋时人。天王封于唐太宗征高丽间。福神蒋子（按：疑下脱文字）死于钟山下。唐、葛、周三将军，周宣王时人。赵玄坛名公明，秦始皇时高士。关公羽封义勇武安王，始于宋道君。茅君匡裕，庐山法祖。钟馗受享，自玄宗一梦。万回国公文（案：此字当讹），张家子。灶神张单，厕神何丽卿，户神彭质、彭君、彭矫，虐神颞頞三太子。厉神曰伯张，隋朝乃见。火回禄，水玄冥，备存《左氏》。

所谓董狐《搜神记》，指的是干宝《搜神记》，但也并不是干宝书，假其书名而已。其中提到的观音，张道陵，吴真人猛，时真人奇，天王，匡裕，户神彭质、彭君、彭矫，虐神顓頊三太子，厉神伯张，火神回禄，水神玄冥等，均不见元刊《搜神广记》，其余相合者亦多有出入^⑭。这些不见于元刊《搜神广记》的内容，只有一小部分在两种明刊《搜神记》所增补的条目中可以看到，但所叙事实亦有所不同^⑮。可见这是别一本《搜神记》。《龙会兰池录》系元无名氏作品^⑯，因此这本《搜神记》亦可能出自元人手。

上述四种《搜神记》都是记载历代诸神，佛道杂糅，兼及民间淫祀，与干宝书风马牛不相及。可以确定，《文渊阁书目》、《藁竹堂书目》著录的道书《搜神记》就是元代所刊这类书。而《百川书志》著录的神仙书《搜神记》二卷，很可能也是元人秦晋《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的明代刻本，此书原分前后集，而改为二卷，并妄加干宝编。

明代还流传有八卷本《搜神记》。此本原收在嘉靖中何鏊所编《汉魏丛书》百种中，未刊，万历中程荣刊三十八种，今存，中未有《搜神记》。万历二十年（1592）屠隆亦据何鏊稿本刊六十卷《汉魏丛书》，见《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类书类著录，已佚。何允中曾见屠刊本，所刊《广汉魏丛书》七十六种可能就是根据屠刊本重刻的，书前有屠隆万历二十年序。至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王谟又据何刊本增补为《增订汉魏丛书》八十六种，何本王本均有八卷本《搜神记》^⑰。另外，万历壬寅（三十年）商濬编刊《稗海》^⑱，中亦收八卷本《搜神记》，此本与《广汉魏丛书》本文字相同，大约即据《汉魏丛书》本刊刻。民国间王文濡辑《说库》，也收入八卷本。

与元明刊四种托名《搜神记》的道书不同，八卷本《搜神记》径题晋干宝撰，而内容亦接近干宝书，所以王谟认为它是干宝书的残本^⑲，其实纯系冒名干宝的贗书。关于八卷本，范宁解放

前曾撰《八卷本搜神记考辨》^{②③}，考证颇详，1964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第一期的《关于〈搜神记〉》一文，第一部分《甲 八卷本》又重申前之考辨。他提出六个方面的证据力驳王谟之说，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是这样几点：一是八卷本有后代官制，如都护府、尚书员外为隋唐官制；二是有后代地名，如定州置于北魏，越州置于南朝宋，易州置于唐；三是有后世之人和事，如卷一为后魏事，京兆韦英宅见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卷四崔皓即后魏崔浩；四是书中多改窜唐人书，如卷六德化张令出《太平广记》卷三五〇引《纂异记》，卷七李楚宾、李汾事出《太平广记》卷三六九、卷四三九引《集异记》，僧志玄事改窜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四《唐沙门志玄传》。范宁的结论是：“此书不是干宝所撰，实唐宋以后人所撰集，且多处系窜改他书成文。”

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还可举出其他一些证据，如卷八李德用事实取《太平广记》卷一二八《王安国》，出《集异记》，只不过改变了人名，并将“唐宝历三年冬夜”改为“元嘉中年元夜”，以没其迹，而其余文字基本相同。八卷本从《集异记》采事凡三，这三事都应出自晚唐陆勋的《集异记》^{②④}。前文《纂异记》，亦晚唐小说，李玫撰。又如卷五赵明甫、李进勅二事，即《广记》卷一一七、卷一一八引《报应录》之《范明府》、《熊慎》，改易人名，又加以敷衍。《报应录》，五代王穀撰^{②⑤}。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证据，八卷本共四十条，与历代古书所引《搜神记》来对照，只有卷三随侯珠、盘瓠、雍州神树，卷四燕惠王墓狐狸、陈司空、太祖亡儿六事相合，不足六分之一，而且这六事的故事情节也有很大差异，更不用说文字的差别了。因此八卷本肯定是宋以后人杂采包括《搜神记》在内的诸书编纂而成的。有的学者反对范宁的意见，认为八卷本与通行的二十卷本有密切关系，“并不一定要否定八卷本为《搜神记》残本的说法”，意思是它确实是干宝书的残本，只不过其中“杂入非干宝原书的条目”^{②⑥}，这种说法绝难成

立，它和干宝书的关系其实就是窃用了干宝书的名字和少许内容而已。而且用八卷本和二十卷本对照也极不科学，因为二十卷本是个很不可靠的辑录本，要对照只能和经过鉴别的《搜神记》佚文来对照。下文我们将要讨论到二十卷本是如何从八卷本误辑许多条目的，若不明乎此，而用二十卷本反转来证明八卷本之不伪，那真是以伪证真，岂不乱套！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六《魏洛阳释道辩传》曾云道辩弟子昙永撰《搜神论》，范宁据而认为八卷本“或即据昙永所撰的《搜神论》残卷而增补的。因出于佛徒之手，所以很多冥报的故事”。这自然只是推测，不过从书中卷五“李进勛”末所云“余尝览佛书，见论十千天子报恩，何异于是乎”来看，作者即非僧人，亦必为奉佛的佛教信徒，而且对干宝身世并不了解，所以书中采入大量东晋以后事而又托名干宝。佛徒之所以托干宝《搜神记》以纂此书，因为自晋以来佛徒极重《搜神记》。本来《搜神记》没有太多的佛教内容，但佛徒认为其中的许多故事都可以成为佛教教义的例证，刘宋宗炳《明佛论》^②曾说：“干宝、孙盛之史，无语称佛而妙化实彰。”所说干宝之史，不单指《晋纪》，实际也兼指《搜神记》。唐初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法琳《破邪论》卷下都提到过干宝《搜神录》，而唐初释道世编佛教类书《法苑珠林》更是大量征引《搜神记》，原因都是因为《搜神记》可以发挥“无语称佛而妙化实彰”的弘佛功能。佛徒看重干宝书或许还和干宝后裔慧因是名僧有关，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因传》载：“释慧因，俗姓于（干）氏，吴郡海盐人也。晋太常宝之后胤。祖朴，梁散骑常侍，父元显，梁中书舍人，并硕学英才，世济其美。”慧因自梁入唐，年高望重，这恐怕也可以影响到唐初僧人对乃祖干宝的重视了。可以说在佛徒的文献传承体系中干宝《搜神记》是件有分量的东西，所以才有赵宋以后人托名干宝纂集别本《搜神记》，所以也才有句道兴《搜神记》的编

纂并被藏于敦煌石窟。

范宁在考证八卷本《搜神记》出于昙永《搜神论》时，又疑八卷本即《遂初堂书目》中的《搜神总记》（按：应为《搜神摭记》）及《崇文总目》中的《搜神总论》（按：应为《搜神总记》），这自然也只是猜测。他研究八卷本没有提到句道兴《搜神记》，这是个重大失误。《敦煌变文集》所辑校的句本存三十五事，有十五事见于八卷本，集中在八卷本前三卷，卷五也有二事，因此可以判定八卷本和句本有密切联系。张锡厚《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引用日人内田道夫《搜神记的世界》说：“八卷本中多数故事同敦煌本有着一致之处，因而，一直认为来历不明的八卷本，却是从敦煌本系统中引出来的，但又不是直接出自敦煌本。至少可以这样假定，确有和敦煌本同一系统的《搜神记》存在，故而推测八卷本是追随它们之后而产生也是可能的。”^⑥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据笔者研究，句道兴是唐初下层文人^⑦，他可能出于对干宝《搜神记》的仰慕，故而也纂集一本《搜神记》。此书以抄本流传于民间和寺院，而且流传很广，所以在敦煌文书中有多个写本^⑧。它虽发现于敦煌，但实际并未消失，大约在宋代有佛徒对此书的某一种已经残缺的写本进行增订补缀，这便是八卷本了。

句本只有少许条目见于《搜神记》，而且文字不同^⑨，正如八卷本非干宝书一样，它也和干宝书没有关系。项楚《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本事考》说：“不过仔细探究起来，若干蛛丝马迹表明，它和《稗海》本《搜神记》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和干宝《搜神记》则并不相干。”^⑩张锡厚则认为“它的渊源所自，极可能是从干宝《搜神记》原书，择其所需，选编成册”，意思是句本是干宝原书的选本。内田道夫也说：“可以假定八卷本的祖本和二十卷本同出于古本是可信的，那么敦煌本也是由之派生出来的民众的写本。”他们都把句本、八卷本、二十卷本看作是干宝《搜神记》的不同版本，这是绝对错误的。致误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就是

太相信二十卷本的可靠性了。

三、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考

《搜神记》二十卷本首载于《秘册汇函》，《秘册汇函》由海盐人胡震亨和姚士粦编刊于万历中，收书二十四种，由于是随刻随续，非一时刊成^④，所以《千顷堂书目》类书类著录胡震亨、姚士粦《秘册汇函》只作二十卷，当是最初刊成的数种。书未刊竟而毁于火，残版归常熟毛晋，胡震亨等人复为之纂辑，毛晋刊为《津逮秘书》^⑤，其中《搜神记》二十卷，即用《秘册汇函》版^⑥。

这本《搜神记》，在书前绣水沈士龙和海盐胡震亨所作《搜神记引》中均未交待来历，也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只是对书中个别内容表示质疑^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搜神记》提要引证许多古书，认为此本辑自古书，提要云：“然其书叙事多古雅，而书中诸论亦非六朝人不能作，与他伪书不同。疑其即诸书所引，缀合残文，傅以他说。……观书中谢尚无子一条，《太平广记》三百二十二卷引之，注曰出《志怪录》，是则据拾之明证。胡震亨跋，但称谢尚为镇西将军在穆帝永和中，宝此书尝示刘惔，惔卒于明帝大宁中，则书在尚加镇西将军之前二十余年，疑为后人所附益，犹未考此条之非本书也。”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搜神记跋》认为《津逮秘书》二十卷本“当为足本，然亦非原书”，他说：“盖原书虽统论鬼神事，仍各有篇目。如《水经注》引张公直事云出于宝《感应篇》，《荆楚岁时记》又引于宝《变化篇》，必皆原书篇名。而毛本皆不见此体例，故其书前后亦无伦次，特较《丛书》（《汉魏丛书》）本为完善耳。”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此本所载，证以古书所引，或有或无，当属宋以后联缀旧文而以他说增益成帙，非当时之原书也。故于第六卷乃全抄两汉志书《五行志》，而续以《晋书·五行志》中三国事，一字不改，其依托之显然者也。”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一八也认为是“自诸书录出”，他说：

“诸家所引，又或不见于今书，可见其非干宝原书，《提要》疑之，是也。……余谓此书似出后人缀辑，但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中亦谓《搜神记》二十卷“亦非原书”，而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中更是非常明确地说：“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他不仅指出二十卷本是明人辑录的，而且还指出书中不尽是干宝书的内容，还加进去别的志怪书中的内容，因此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

鲁迅的看法非常正确，可以说已成定论，中华书局版《搜神记》的《出版说明》就采纳了鲁迅这个说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在讨论二十卷本时说：“然核其体例，俨然古籍，不与他伪书等，盖由其人本有学识，善于作伪，若非细心搜讨，无从知其伪也。”确实，由于二十卷本的刊行者胡震亨以“秘册”相标榜，所以蒙骗了许多人，但经历代学者研究终于明了了其为辑录本而非原书。尤其是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称得上是“细心搜讨”，更证实了二十卷本的“半真半假”的性质。

但是鲁迅和上述诸人都未指出二十卷本究竟是哪个明人辑录的，范宁 1957 年在《论魏晋中国小说的传播和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关系》^④一文中指出：“原书佚散，今通行本乃明人胡元瑞（胡应麟字元瑞）辑录。”后又在 1964 年所发表《关于〈搜神记〉》中，根据胡应麟《甲乙剩言》和姚士粦《见只编》的记载重新考证了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的问题^⑤。这个看法也非常正确，也可以说已成定论，中华书局版《搜神记》的《出版说明》也采纳了这个说法^⑥。笔者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也是依据范宁的考证加以发挥的。但是，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的时间及辑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问题，胡辑本被收入《秘册汇函》的原委，这些问题无论范宁还是拙著《唐前志怪小说史》都还未予深究。下边我们就来仔细探

讨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搜神记》及胡辑本刊入《秘册汇函》这个问题的许多细节。

姚士粦《见只编》卷中云：

江南藏书，胡元瑞号为最富，余尝见其书目，较之馆阁藏本，目有加益，然经学训注，稍有不及。有《搜神记》，余欣然索看，胡云不敢以诒知者，率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抄出者。

胡应麟《甲乙剩言·知己传》云：

余尝于潞河道中，与嘉禾姚叔祥（按：叔祥姚士粦字）评论古今四部书。姚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艺文》、《初学》、《书抄》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邪？大都后出异书，皆此类也。……”

把这两条记载对照起来读，可知胡应麟确实辑录过《搜神记》，并把辑录好的本子著录在自己藏书的书目中^⑦。在潞河与姚士粦谈论古书，姚见其藏书目录中有《搜神记》这部久佚不传的古书，不免大吃一惊，胡应麟不敢欺瞒姚士粦这位谙熟古书的专家，便坦然相告乃辑自类书，凡举五种，都是唐宋类书。他虽然没有明言是他本人辑录，但实际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姚士粦并不追问是何人辑录^⑧。

实际上胡应麟对前代文言小说一直有着特殊爱好，并一向就有辑录古小说的兴趣，这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有突出反映。他少年时即曾辑录书名带“异”字的志怪小说为《百家异苑》，并作《百家异苑序》^⑨，又曾“遍搜诸小说”，辑录鬼诗一集数百篇^⑩。并“尝欲取宋太平兴国后及辽金元氏以迄于明，凡小说中涉怪者，分门析类，续成《广记》之书，殆亦五百余卷”，但因卷帙繁重，这部《续太平广记》终未成书^⑪。另外他还有憾于“古今小说之祖”《汲冢琐语》的不传，打算从战国秦汉古书中杂摭语怪、近实、远

诬者，“凡瓌异之事，汇为一编，以补汲冢之旧”^{④2}，大约也没有成书。胡应麟既对辑录古小说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他又颇为赏识干宝《搜神记》，说“令升（干宝字）、元亮（陶潜字）博于神”^{④3}，因此他辑录《搜神记》自在情理之中。而且，胡应麟藏书极为丰富，王世贞万历八年作《二酉山房记》，称胡元瑞藏书“合之为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④4}，确如姚士粦所说，“江南藏书，胡元瑞号为最富”，这也就使得他辑录古书有了很充分的图书保证。

那么胡应麟是什么时候辑录的《搜神记》呢？据吴晗《胡应麟年谱》，万历二十二年（1594）胡应麟挈家从故乡兰溪入京应试，寄寓潞河胡谷元家，准备参加明年春会试，时与诸友好晨夕过从^{④5}，他和姚士粦谈论《搜神记》即在此时。《搜神记》既然已经编入《二酉山房书目》，说明《搜神记》辑成于万历二十二年以前。

胡应麟辑录《搜神记》，除主要利用他提到的唐宋古书外也有明人书，其中十分重要的是陈耀文所编的类书《天中记》六十卷。陈耀文字晦伯，汝宁府确山人。民国《确山县志》卷一八《人物下》载：“登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中书舍人。官有余闲，得博极群书，自经史外若坟典邱索、奇文奥字以及星历术数，无不毕览。”《天中记》是他在故乡家居时所编，以所居近汝南天中山，故取为书名。《天中记》今存光绪四年戊寅（1878）听雨山房重镌本，前有万历乙未（二十三年，1595）屠隆序、万历己丑（十七年，1589）陈文烛叙、洪吉亮叙、李蓑隆庆己巳（三年，1569）叙。洪叙后题“古闽林则徐校刊”，则听雨山房乃据林则徐校刊本重刻。李叙云：“盖自登第迄今历二十年而乃成此书。”陈耀文嘉靖二十九年登进士第，去隆庆己巳恰二十年。李叙称“凡分类□分卷□”，类数卷数皆空缺，似其时所成为初稿，尚未编目分卷。而陈叙云：“汝南有天中山，陈晦伯先生记类书而辑之，盖著作藏名山之意云。余访先生精舍，委序语余。稿凡四易……”殆至万历十七年前又曾修订方定其稿。是书每卷卷首皆题

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四明屠隆纬贞甫校，则似由屠隆初刻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岁。

有证据表明，二十卷本《搜神记》有不少条目辑自《天中记》，兹举例如下：

1. 《天中记》卷四〇引《教住》条，注《搜神秘览》。《搜神秘览》北宋章炳文撰，此事载于卷上，题《王旻》。《天中记》所引文字有讹误，如“大若人”原作“客人”，乃以“客”字误析为“大若”二字，不知古地名并无大若。二十卷本卷三有此条，文字与《天中记》全同，“客”亦讹作“大若”。

2. 二十卷本卷一三：“蜚蠊，蠊也。尝通梦于人，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又：“木蠹生虫，羽化为蝶。”此二条未见他书引作《搜神记》，仅见《天中记》卷五七，注出《搜神记》，必是据《天中记》所辑。

3. 《天中记》凡引八卷本《搜神记》六条，见于二十卷本者五条。《天中记》卷二《南斗注生》原出八卷本卷一，此删缩原文而成，“赵颜”误作“颜超”，盖倒置姓名又讹“赵”为“超”，其余亦有小异，如“见赵子寿可十九岁”，《天中记》作“见超寿止可十九岁”。而二十卷本卷三全同《天中记》。《天中记》卷五四引李信纯义犬事，见八卷本卷五，惟太守邓瑕《天中记》作郑瑕。二十卷本卷二〇辑入此事，文同《天中记》，亦作郑瑕。《天中记》卷五六引楚僚事，见八卷本卷五，视原文多有删削，二十卷本全同《天中记》。《天中记》在引文之后又云：“晋王祥、王延事同。”乃编者陈耀文说明之辞，因为《天中记》于卷一七曾引王祥、王延事（分别引自《晋书》、《三十国春秋》）所以在这里又加以特别说明，而二十卷本卷一一辑此条末亦云：“此与王祥、王延事同。”误为正文，这是辑自《天中记》的明证。

二十卷本中所见于八卷本的条目还有唐父喻、辛道度、千日酒三条，而前两条《天中记》也有引录，但和二十卷本的关系却

有些疑问。《天中记》卷一九《更生》，即唐父喻再生事，见于八卷本卷二、二十卷本一五。《天中记》全同八卷本，惟个别文字有异，如“必活”讹作“不活”，“寿年一百二十岁”作“寿年一百一十岁”。二十卷本则异文较多，上述例证“必活”作“即活”，“二十”作“三十”，其余如“少小之时”作“少时”，“落陷”作“落堕”，“乡人”作“邻人”，“何在”作“安在”，“死生”作“生死”，“平生”作“生平”，“以保终身”作“以结终身”，“为父强逼”作“父母强逼”等，均不同八卷本和《天中记》。《天中记》卷一九《附马》，即八卷本卷一及二十卷本的“辛道度”。《天中记》有所删削，二十卷本亦经删削，而删后文句与《天中记》全同，似取《天中记》而成，但文字与《天中记》时有不合，如《天中记》“经三宿三日后”，二十卷本“后”作“俄”，连下读，“盒子”作“盂子”，“此会可三宵”作“此会只可三宵”，“东游”作“车游”，“诘”作“语”，“原葬悉在”作“原葬诸物悉在”，等等，而凡此皆与八卷本同。然个别处亦有与八卷本不合者，如八卷本“视其金枕，怀乃无异”，二十卷本作“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而乃与《天中记》同。千日酒一事《天中记》未引八卷本，卷四四所引为《博物志》。比较八卷本卷三与二十卷本卷一九所载，二十卷本文字微有删节，并有校改处，如“乃命家人”改作“乃命其家人”，文义更明，又将“时有州人姓玄名石”，改作“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则是改用《博物志》（卷一〇）之说。

《天中记》卷五四引《搜神记》李汾事，删节自八卷本卷七。此条二十卷本未辑，因为事在永和末，为干宝死后之事。而《搜神后记》也未辑入，想必辑录者也知道它实际出《太平广记》卷四三九引《集异记》，本是唐天宝末之事。

上述现象表明，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搜神记》时，开始并未见到八卷本。且不说《稗海》刊于万历三十年（1602），而此年夏胡应麟已卒^④，他不可能见到，何鏜嘉靖中编的《汉魏丛书》未

刊稿本，他也未见，否则他会直接从八卷本中辑录。屠隆万历二十年始刊《汉魏丛书》，其时胡应麟辑录《搜神记》恐怕已经完成了。因此二十卷本中涉及八卷本的条目主要是据《天中记》辑录。实际上参考《天中记》的材料辑录《搜神记》除前边的举证外还有不少。《天中记》初稿完成于隆庆三年，万历十七年前修订定稿，虽然它可能万历二十三年才由屠隆刊行，但我们有理由推断胡应麟可以得到《天中记》的抄本。万历十七年陈文烛为《天中记》作叙，而陈文烛也是胡应麟的朋友，胡曾请他为《少室山房笔丛》作序。陈文烛序末未纪年月，考序中提到《笔丛》的《经籍会同》至《艺林学山》十部分，惟独没有万历二十年撰成的《玉壶遐览》、《双树幻抄》这最后两部分，而《艺林学山》成于万历十九年七月，则陈序当作于十九年。由此推测《天中记》的抄本可能是通过陈文烛得到的，时间可能在万历十七年至十九年间。这一点有助于推断胡应麟辑录《搜神记》的时间，至少可以知道在万历十七年还未成书，尚在辑录过程中，但也可能还未动手。倘若大体估计一下，《搜神记》大约辑录于万历十七年前后至二十二年以前这段时间内。

至于上述疑点，可能是胡应麟在见到《汉魏丛书》八卷本后又将有关条目作了修订，也可能是在刊入《秘册汇函》前由他人修补改动过。如“千日酒”一条，《汉魏丛书》本之“方见张目开口”，《稗海》本作“方见开目张口”，而二十卷本与《稗海》本同，然则此条似为他人据《稗海》本所增。再考虑到八卷本及《天中记》的版本因素和抄写的错误等因素，上述疑点也可以得到解释。

《搜神记》辑本是何以被刻入《秘册汇函》的，范宁说“盖其所刻当即胡元瑞之辑本而经由姚叔祥为之介绍者也”。这个判断很正确，因为姚叔祥知道胡应麟辑有《搜神记》，而《秘册汇函》又恰是他和胡震亨一起编纂的。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姚叟士舜》载：

士舜，字叔祥，海盐人，与里人胡震亨孝辕同学，以奥博相尚，搜讨秦汉以来遗文秘简，撰《秘册汇函》若干卷，跋尾各为考据，具有原委。^⑦

在这种情况下，姚士舜将胡应麟所辑《搜神记》编入《秘册汇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里还有一层缘故，就是姚、胡都是海盐人，而干宝祖上自新蔡南徙后也居海盐，胡震亨和海盐知县樊维城编纂《海盐县图经》就载入干宝传记，因此《汇函》收干宝《搜神记》不仅企图以辑本冒充秘册，也是张扬本土人物之意。出自同样的目的，胡震亨和樊维城在天启三年（1623）编印海盐籍人著作为丛书《盐邑志林》时也将《搜神记》收入（合为上下两卷）。

《秘册汇函》是随编随刊的，周本淳考证，胡震亨与姚士舜刻《秘册汇函》应始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证据当是姚士舜《见只编》卷中所载：“余与吕锡侯有好书癖，尝从武林书肆得书三种，曰《异苑》，为六朝刘敬叔撰……因相与校订，更从类书诸注少有补缀。……《异苑》为胡孝辕与余录得，刻之《秘册汇函》。”及胡震亨《异苑题辞》：“戊子岁，余就试临安，同友人姚叔祥、吕锡侯诣徐贾检书……得刘敬叔《异苑》，是宋纸所抄。……易归，各录一通，随各证定讹漏，互录简端。……又十年为戊戌，下第南归，与友人沈汝纳同舟，出示之，复共证定百许字，遂称善本。”按此年校定《异苑》，但刻《秘册汇函》未必就在此年。周本淳考证万历三十一年癸卯胡震亨与毛晋共同校定十九种罕见之书，刻成《秘册汇函》，证据是《汉杂事秘辛》、《李氏易解附郑康成注》识语均有“癸卯”字样^⑧。但这也只能证明此年在刻《秘册汇函》，未必十九种书都已刻完。那么《搜神记》究竟刻于什么时候呢？考梅鼎祚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编成的《才鬼记》，书中卷一凡引《搜神记》三篇，《段孝直》实见于八卷本卷二，《崔少府君女》转引自《太平广记》卷三六一，《刘伯文》转引自《后汉书·五行志》注。

如果不是梅鼎祚未见到胡刊《搜神记》的话，那么就是当时《秘册汇函》尚未刊出《搜神记》。推断起来，应当说胡辑《搜神记》刊于胡应麟万历三十年死后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二十卷本的问题太多，辑有大量未见诸书引作《搜神记》而见于他书的内容。笔者先前出于对文坛巨子胡应麟的信赖，曾推测胡应麟辑录《搜神记》可能有《搜神记》残本做依据，在此基础上依据类书进行补辑，就是为了解释这一疑问^④。台湾学者王国良则怀疑明代有《搜神记》残本的说法，他认为：“胡震亨等人辑刻《秘册汇函》，开始于万历三十一年，而胡应麟卒于三十年夏天，他所辑成的《搜神记》，会不会被出版界的朋友动了手脚，实在不敢说。”^⑤现在看来王国良的看法很有道理，胡应麟定稿的辑本未必就是现在看到的二十卷本的样子，很可能是在他死后由胡、姚等人重新作了增补，大量取入他书文字以充篇幅。一个可资参考的类似例证是《秘册汇函》中的《异苑》也未必是原书，可能是后人辑本，胡、姚等人在校订时也加进去大量《异苑》之外的他书文字^⑥。胡震亨《秘册汇函小引》云：“抄书旧有百函，今刻其论序已定者，导夫先路，续而广之。”所谓“论序已定”，其中就包含着对《搜神记》、《异苑》这类辑佚书的修订工作。胡辑本原稿分没分卷分多少卷不得而知，但未必就已分为二十卷，因为既然增补了大量内容，必然在卷帙分析上有变，故疑二十卷是胡、姚等人增补修订后所分。胡震亨等编刊《盐邑志林》，《搜神记》则合为二卷，这也说明《搜神记》辑本分卷本来就不是早已确定好了的。

干宝《搜神记》原书三十卷，辑本则为二十卷。按《晋书·干宝传》所载《搜神记》卷数，不同版本有二十卷和三十卷之异，中华书局点校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工作本，作三十卷，《册府元龟》卷五五五《国史部·采撰一》及《晋书斟注》等俱同。然王谟《搜神记跋》引《晋书》本传作二十卷，且以证《隋唐志》三十卷之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均称

《晋书》干宝本传作二十卷，今本卷数与本传合。而武英殿聚珍版本、《四库全书》本等《晋书》版本恰均作二十卷。胡应麟或胡震亨、姚士粦等所见《晋书》版本必是作二十卷，所以也编定为二十卷，以充全帙。

四、胡应麟辑录《搜神后记》考

《搜神后记》是《搜神记》的续书，唐宋类书多称作《续搜神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搜神后记》十卷，陶潜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同。两《唐志》及宋元书目，除《通志·艺文略》传记类冥异属据《隋志》著录外，皆无载。《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多引之，然《绀珠集》、《类说》未有摘录，看来该书亡于宋。元末陶宗仪《说郛》卷四摘录晋陶潜《续搜神记》三条，陶氏于所取之书皆于书题下标明原书卷数，此书未标，当是转据类书而摘，非见原书。

《秘册汇函》中也刊入《搜神后记》十卷，题晋陶潜撰，撰名同《隋志》。后版归毛晋，刊入《津逮秘书》。《秘册汇函》也没有交待《搜神后记》版本来历，沈士龙《搜神记小引》云：“至于《后记》，多后人附益，绝非元亮本书。如元亮卒于宋元嘉四年，而有十四、十六年等事。《陶集》多不称宋代年号，以干支代之，何得书永初、元嘉？又诸葛长民与宋武，比肩晋臣也，陶必不谓伏诛。凡此数事，皆不可不与海内淹赡晓辩之也。”胡震亨《搜神记小引》云：“若渊明《后记》，梁皎法师称其傍出高僧，叙其风素，王曼颖报书亦云高僧行迹糅在元亮之说。今记中仅佛图澄、昙游二人，应散佚不少。”只指出《后记》内容多后人附益及散佚不少，但都没有说此十卷本是后人辑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小说家类三《搜神后记》提要称“今所传刻者犹古本”，“题陶潜撰者固妄，要不可谓六代遗书”。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六小说家类据《津逮秘书》著录，本《四库提要》为说，认为“所记词致

雅饬，体例严整，实非抄撮补缀而成，当由隋以前人所依托，与世所传于（干）氏《搜神记》固迥然不侔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也举《法苑珠林》所引《续搜神记》或《搜神续记》“多大同小异”为证，以为“益可证古本无大异同”。

范宁在《论魏晋中国小说的传播和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关系》中则明确指出今本“实非原帙”，他举卷七“刘聪”条“聪后刘氏产一蛇一兽”，《魏书》卷九五《刘聪传》“兽”作“虎”，以为唐人撰修《晋书》避讳改“虎”为“兽”，此处显系抄袭《晋书》原文^②，又举《玉烛宝典》卷七引“钩鹄”条不见今本，他认为今本是赵宋后人辑录的。王国良也以为今本乃辑本，说是“明季始有好事者收集古注类书所引遗文，重加编排刊行”^③。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依其校注《搜神记》例，逐条一一考证所出，认为“本书亦出后人纂辑，中有窜乱”^④，与二十卷本《搜神记》属同样性质。

今本《后记》确实是后人所辑，辑录质量也很差，因而留下许多疑点，使人怀疑《后记》究竟是不是陶潜所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小说家类三《搜神后记》提要引沈士龙跋，即认为“其为伪托，固不待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六亦以为“依托”之书，都是认为它是后人托名陶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十分明确地说：“续干宝书者，有《搜神后记》十卷。题陶潜撰。其书今具存，亦记灵异变化之事如前记，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四库提要》和鲁迅的说法影响很大，《搜神后记·出版说明》即引述上述观点，称本书为“贗撰驾名”之作。书中卷八“盛道儿”条为宋元嘉十四年事，而此条《太平广记》卷三二五引作《搜神记》，汪绍楹校云“当是《续搜神记》”，陶潜卒于元嘉四年^⑤，汪绍楹之所以未说明此条非属本书，自然也

是认为本书并非陶潜所作。其实，诚如范宁所说：“这部书旧题陶渊明作，有人怀疑这个说法靠不住，但无确证。”上述种种证据实际都难成立。书中固然有元嘉四年后事^⑤，但类书引录多误书名，或者为后人增益，这都是常见现象。说《陶集》多不称宋代年号，以干支代之，这是沿袭了《宋书》本传的不合事实的说法，前人早已有辨^⑥。至于说陶潜旷达，殊不知陶潜也喜读古怪之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⑦者便是，此亦正颜延之《陶徵士诔》之所谓“心好异书”，因此陶潜未必没有拳拳于鬼神的时候。相反，说陶潜撰《搜神后记》倒有许多旁证。梁释慧皎在《高僧传序》中已经说过：“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俊《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徵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阙。”《高僧传》附王曼颖与慧皎书亦称：“兼且搀出君台之记，糅在元亮之说，感应或所商榷，幽明不无梗槩，泛显傍文，未足光阐。”“元亮之说”指的就是陶潜（字元亮）《搜神录》。此后，隋萧吉《五行记》“车甲”条也引自陶潜《搜神记》（《太平广记》卷四四三引）。唐初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神僧感通录》著录有《搜神录》，下注陶元亮，释法琳《破邪论》卷下亦载：“晋中书侍郎干宝撰《搜神录》，彭泽令陶元亮撰《搜神录》。”自梁至唐初都众口一词地提到陶潜《搜神录》，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只不过佛徒把《搜神记》、《搜神后记》都称作《搜神录》，书名相混。实在不应剥夺陶潜对《搜神后记》的著作权，清人王谟早已感叹前人编次陶集于此书“弃而不省”，不过那主要不是出于“漫以为稗官小说”的轻视，而是不认为是陶潜作品^⑧。

《搜神后记》与《搜神记》同时刊于《秘册汇函》，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它也是原由胡应麟辑录的，并且也经过了胡震亨等人的修订。实际上辑录《搜神记》绝对要涉及到《后记》，因为二书

密切相关，一个显著现象是类书古注等在引用时常常是同一条目此作《搜神记》彼作《续搜神记》，或者是本属于书而误作陶书，本属陶书而误作干书，这样在辑录时就不能不加以甄别辨析。既然如此，既然辑录干书的过程实际也包含着对陶书佚文的搜集整理，也就是说虽为二书但却是一个统一的操作过程，那么在辑录干书时同时也辑录陶书，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说陶书佚文并不很多。

这里可以举出一些具体事例，可以看出二书的辑录出自一手。今本卷五“白水素女”，《艺文类聚》、《北户录》、《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三洞群仙录》、《类说》都引作《搜神记》，无一书作《续搜神记》，但是偏偏二十卷本《搜神记》未辑而辑入《后记》。原来诸书所引原作“晋安侯官人谢端”，晋安指晋安郡，侯官是其属县，可是辑录者误将晋安理解成晋安帝，遂在“安”字下妄加“帝时”二字，而干宝在晋安帝时已亡，所以辑录者便辑为陶书。显然，只有同一人辑录二书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又如，吴猛的几件事迹，诸书所引或作《搜神记》或作《续搜神记》，辑录者分别辑入《搜神记》卷一和《后记》卷二，绝不重复，比如吴猛至孝一节辑入《后记》，尽管《太平御览》、《事类赋注》多处引作《搜神记》，《搜神记》也不再辑录。再如，“赵固”、“吴望子”、“卢充”三条，诸书所引也不一致，而文字详略不同，辑录者二书俱辑，但都是一简一繁，文字绝不两相重复。

从二书的体例编排上看，都是同类题材集中在一起，而题材的编排次序，《后记》大体是卷一神仙，卷二道术，卷三徵应，卷四复生及化物，卷五神灵，卷六鬼，卷七卷八妖怪，卷九卷十动物及精怪。《搜神记》的题材比《后记》丰富，就与《后记》相类似的题材看，排列次序是：神仙、道术、神灵、妖怪、徵应、复生、鬼、精怪、动物，虽有调整但大体是差不多的。

凡此都表明胡应麟在辑录《搜神记》时同时也辑录了《后

记》，辑本中也大量辑录进他书文字，可能也是胡震亨、姚士粦等人动了手脚的结果^⑥。

《搜神记》是古代志怪小说的经典，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国外汉学界尤重此书，研究的人很多。但是人们所依据的本子都是通行的二十卷本，因此搞清二十卷本的问题及相关问题并重新辑录整理《搜神记》和《搜神后记》就显得十分重要。笔者之所以要在汪绍楹等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辑校《搜神记》和《搜神后记》，就是为能整理出一个新的比较可靠的本子。这项工作困难很多，希望能得到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

注：

①见第五章第三节，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82—289页。

②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搜神记二十卷》云：“不知是否一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册，1138页。按：“总”字又作“摠”，与“摠”字形近，故疑“摠”乃“总”之讹。

③张锡厚：《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兼论二十卷本、八卷本〈搜神记〉》：“宋代以后已见不到三十卷本《搜神记》，《宋史·艺文志》卷二〇六只著录‘干宝《搜神总记》十卷’。可惜的是，就连这个十卷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文字评论丛刊》16辑。

④“阿香”条诸书或引作《搜神记》，或引作《续搜神记》，今本《搜神后记》卷五辑入。事在永和中，必出《续记》。

⑤此事见《太平广记》卷四七四引《穷神秘苑》，而《穷神秘苑》乃引《妖异记》，为后魏庄帝永安二年（529）事，远在干宝之后。

⑥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六小说家类异闻属云：“然《读书志》、《书录解题》均不载，疑其书宋时已佚。”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晁、陈书目皆不著录，则宝书在南宋似已不传。”1138页。

⑦先前笔者曾认为干宝《搜神记》明代有残本存世，如今重新检讨感到可能性不大。见《唐前志怪小说史》282页。

⑧按：范宁《关于〈搜神记〉》（《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引罗懋登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序，知与《续道藏》本乃一书，则登即罗懋登，作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者也。《出像增补搜神记》当有绘图，《续道藏》本删去，故但称《搜神记》。《出像》本未见。

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影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收入此书，《出版说明》称“据干宝本重新编撰”，误。

⑩先前笔者认为此本可能是罗懋登所撰集，重新检讨觉得可能性不大。见《唐前志怪小说史》282页注①。

⑪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明》称元秦子晋撰，与目录所题淮海秦晋不合。

⑫见叶德辉：《重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后序》。

⑬明刊《绣谷春容》卷二亦载，题《龙会兰池全录》。

⑭如元刊《搜神广记》及明增补二种云许真君蜀旌阳县令，宋真宗封关羽义勇武安王，宋徽宗封崇宁至道真君，皆与此有异。

⑮如明刊二种云天王降神于唐太宗从高祖起义兵时，封于高祖即位后，庐山匡续号匡阜先生，与此不同。

⑯参见李剑国、何长江：《〈龙会兰池录〉产生时代考》，《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⑰参见王谟：《增订汉魏丛书·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丛书百部提要》。

⑱《稗海》康熙重刊无商濬序。程毅中《古代丛书琐谈》云：“郑振铎先生旧藏的《稗海大观》，作为《稗海》的初印本，保存着万历壬寅（三十年，1602）商濬的序和陈汝元的凡例。”见《学林漫录》14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⑲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搜神记跋》：“今《丛书》本只存八卷，固为残缺，毛氏《津逮秘书》乃有二十卷，当为足本。”

⑳载于《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7月18日、25日。

㉑参见拙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册，834-83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㉒参见拙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册，1080页。

㉓张锡厚：《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

㉔载梁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二。

㉕《文化》1951年第17卷第3期。

②⑥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册，177—178页。

②⑦《敦煌变文集》卷八王庆菽校辑句道兴《搜神记》，凡用日本中村不折藏本、斯0525、斯6022、伯2656四本，《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六本，又有斯2072，伯5545，据日本金冈照光《敦煌出土文书文献分类目录》还有斯3877本，凡七本。然据张锡厚研究，斯2072系某类书残卷，伯2656是《孝子传》之类作品，均非句道兴《搜神记》写本。台湾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十五册亦将斯2072著录为佚类书。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

②⑧除去二十卷本《搜神记》误辑自八卷本者，确实为干宝书所载者有郭巨、丁兰、董永、随侯珠、张嵩五事。郭巨、董永、随侯珠皆见二十卷本，丁兰见中华书局1979版汪绍楹校注《搜神记》所辑佚文，张嵩事伯2656类书残卷有引，注“事出《搜神记》也”。

②⑨项楚：《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9页。

③⑩《津逮秘书》卷首载胡震亨《小引》，乃《秘册汇函》之《小引》，云：“抄书旧有百函，今刻其论序已定者，导夫先路，续而广之。”

③⑪胡震亨：《津逮秘书题辞》：“而余向所与亡友沈汝纳氏刻诸杂书，未竟而残于火者，近亦归之君（毛晋），因并合之，名《津逮秘书》以行。”毛晋崇祯庚午（三年，1630）《津逮秘书序》亦言此事。

③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一一《津逮秘书》提要：“震亨初刻所藏古笈为《秘册汇函》，未成而毁于火，因以残版归晋，晋增为此编。凡版心书名在鱼尾下，用宋本旧式者，皆震亨之旧；书名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样者，皆晋所增也。”《搜神记》及《搜神后记》皆书名在鱼尾下，而无汲古阁字样，知用《秘册汇函》版。

③⑬沈氏云：“若令升所载，皆出前史及诸杂记，故晋宋《五行志》往往采之。《晋书》本传称兄气绝复苏，而不名。道书《吴猛传》谓宝兄西安令干庆，而本记第称西安令干庆，而绝不谓兄，亦可疑也。”胡氏云：“第所载秦闵王女一段，则嬴秦无谥闵者。惟晋武帝子秦献王无嗣，闽帝尝以吴王晏子出嗣秦王，岂即愍帝邪？然愍帝时，秦为虏境，秦妃安得在秦而有二十三年之久？至谓‘今之国婿，亦为驸马都尉’，此正晋事耳。又有谢镇西之称，按谢尚于穆帝永和间始加镇西将军。宝书成，尝示刘惔，惔卒于明帝太宁间。则镇西之号，去书成时，尚后二十余年，安得预称此？殊不可晓。”

③⑭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2期。

③⑤范宁说：“这样看来，胡元瑞（胡应麟字元瑞）已经自供曾从类书中辑录过《搜神记》。”“胡元瑞既然说他辑过这部书，那末这个本子是他编辑过的可能性最大。”

③⑥《出版说明》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二十卷本，据考证，可能是明代胡元瑞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的。”

③⑦胡应麟藏书所名二酉藏书山房，书目名《二酉山房书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云“近辑《山房书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55页。据《经籍会通引》，万历己丑十七年（1589）七月成《经籍会通》，则《二酉山房书目》编成于是年。

③⑧《四库提要》引用了《甲乙剩言》，《四库提要辨证》又引证了《见只编》，可惜都没有深究胡应麟本人即其辑录者。

③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下册476—477页。《百家异苑序》又载于《少室山房类稿》卷八三。据吴晗《胡应麟年谱》（原载《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一期，1934年1月），《百家异苑》编成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时十五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76页。

④⑩《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七《二酉缀遗下》，489页。

④⑪《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476页。

④⑫《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474页。

④⑬《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上》，502页。按：这里顺便纠正吴晗《胡应麟年谱》中一处错误，《华阳博议引》末题“己丑仲冬麟识”，知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而《年谱》系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时十五岁，乃误己为乙。《少室山房笔丛》诸篇俱有引，《三坟补逸》成于万历甲申十二年（1584），《四部正讹》成于万历丙戌十四年（1586），《经籍会通》、《史书占毕》、《九流绪论》、《庄岳委谈》成于万历己丑十七年，《丹铅新录》、《艺林学山》成于万历庚寅十八年，《玉壶遐览》、《双树幻抄》成于万历壬辰二十年，惟《二酉缀遗》未纪干支。诸编皆作于万历中，不应《华阳博议》独出嘉靖少年之时。

④⑭见《胡应麟年谱》，《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391页。

④⑮《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418—419页。

④⑯参见《胡应麟年谱》引明吴之器《葵书》卷四《胡应麟传》，422页。

④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排印本下册，656—657 页。

④⑧周本淳：《胡震亨的家世生平及其著述考略》，《杭州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④⑨见《唐前志怪小说史》288 页。

⑤⑩王国良：《〈唐前志怪小说史〉评介》，《小说戏曲研究》第一集，369—370 页。

⑤⑪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下篇《群书叙录·异苑》认为：“今本乃明末好事者，自古注、类书中辑录出遗文，重加编排刊刻而成，既非相传旧本，内容则系真者十之七八，赝者十之二三也。”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版，322 页。按：胡震亨、姚士粦所说在临安得宋纸所抄《异苑》当不诬，确有旧本，盖宋人所辑，胡、姚等人在此本基础上加以增补，非如彼言仅校订文字。

⑤⑫按：此条实抄自《晋书·五行志中》。唐高祖李渊祖名虎，故唐初避虎字。

⑤⑬《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321 页。

⑤⑭中华书局 1981 年版，148 页。

⑤⑮陶潜卒年见《晋书》卷九四、《宋书》卷九三、《南史》卷七五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萧统《陶渊明传》、佚名《莲社高贤传》。

⑤⑯除元嘉十四年，卷一〇又有元嘉二十三年事，但无十六年，沈士龙有误。

⑤⑰参见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二《谈艺二·陶诗甲子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 年版，上册，293—294 页。

⑤⑱《陶渊明集》卷四《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中华书局 1979 年版，133 页。按：《周王传》即《穆天子传》，《山海图》即《山海经》，皆战国古小说。

⑤⑲《增订汉魏丛书·搜神后记跋》。按：《增订汉魏丛书》所收《搜神后记》是《唐宋丛书》的二卷节录本。

⑥⑰王国良谓明季好事者收集古注类书所引遗文重加编排刊行，所指当即胡震亨、姚士粦之辈。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